

晚清徽州茶商变局中的区域经济互动与经营创新

李雅蒙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5年2月21日；录用日期：2025年3月26日；发布日期：2025年4月30日

摘要

晚清徽州茶业的转型是区域经济互动与经营创新协同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通过内生性动力实现传统手工业的现代化调适。本文以徽州茶商为研究对象，结合地方志、茶商合同、商会档案及近代报刊等原始史料，系统探讨茶商如何通过重构市场网络、推动技术革新及引入金融工具实现徽州茶业从传统分散经营向区域一体化经营的转型。研究发现：其一，交通条件改善与联营机制的建立，促使徽商形成以几个经营中心为枢纽的跨区域市场网络，形成区域经济互动；其二，制茶技术的标准化与创新，显著提升了产品竞争力，推动徽州茶叶在市场的崛起；其三，票据交易与合同制度的规范化降低了交易风险，加速了资本流通，为近代金融体系的萌芽提供了实践基础。这一转型不仅是徽商应对晚清经济变局的适应性策略，更为中国传统手工业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重要经验。

关键词

晚清，徽州茶商，区域经济，经营创新，茶业转型

Regional Economic Interaction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Qing Huizhou Tea Merchants

Yameng Li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Feb. 21st, 2025; accepted: Mar. 26th, 2025; published: Apr. 30th, 2025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uizhou tea industry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was the result of the syner-

gistic effect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raction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fundamentally achieved through endogenous forces that modernized traditional handicraft practices. This paper takes Huizhou tea merchants as its research subject and, based on original historical sources such as local chronicles, tea merchant contracts, chamber of commerce archives, and modern newspapers,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how tea merchants restructured market networks, promo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troduc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to transform the Huizhou tea industry from traditional decentralized operations to a regionally integrated management model. The study finds: First, improvements in transport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joint operation mechanisms enabled Huizhou merchants to form a cross-regional market network with several business centers as hubs, foster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raction; second,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ea-making technique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product competitiveness, propelling the rise of Huizhou tea in the market; thir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bill trading and contract systems reduced transaction risks and accelerated capital circulation, providing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nascent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not only an adaptive strategy by Huizhou merchants in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upheavals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but also offered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e modernization pathway of China's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Keywords

Late Qing, Huizhou Tea Merchants, Regional Economy, Business Innovation, Tea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晚清时期，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中国传统手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徽州茶业作为地方传统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经历了由分散的小作坊经营向区域一体化经营的深刻变革。茶商作为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中坚力量，不仅敏锐捕捉到了交通条件改善、市场需求变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机遇，而且通过重构市场网络、推动制茶技术革新以及引入金融工具，有效降低了交易风险，从而实现了徽州茶业经营模式的近代化调适。

2. 晚清徽州茶业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徽商的区域经济互动

2.1. 历史背景

徽州自古以来便以松萝茶、屯绿、祁红等名茶著称，其生产加工工艺和流通模式自明清时期起便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体系，这种体系在晚清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徽州地处山水之间，群山环抱、溪流纵横，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适宜茶树生长的温润气候、肥沃土壤及丰富的水资源，为茶叶种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长期以来，当地农户和茶农在实际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制茶经验，从采摘、初制到后期精制，各工序均蕴含独特技艺。例如，松萝茶以其采摘时对嫩叶标准的严格要求、初制时采用传统蒸青与揉捻工艺、以及精制时特有的烘焙技法而形成独特风味；而屯绿、祁红则在各自工艺上各有所长，展现出区域内不同茶种的多样性和特色^[2]。这种工艺传承不仅体现了徽州茶业的历史深度，也为茶品在市场中的品质保证奠定了坚实基础。

2.2. 徽商的区域经济互动

晚清时期，国内商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徽州地区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深厚的茶业传统，逐渐实现了由传统散户经营向区域一体化经营的转型。徽州茶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制茶工艺和经营方式的革新，更体现为区域经济互动机制的不断完善，其根本动力在于地方经济内生力量与外部市场环境的双重作用。区域经济互动主要体现在跨区域运输网络的构建、家族与宗族经营资本网络的形成以及商会在经济协调中的积极介入上。

随着交通条件逐步改善，原先依赖古道与驿站的茶叶流通格局逐渐转变为以屯溪、上海、广州等几个地区为经营中心的水陆运输体系。例如以上海来看，徽州茶叶从产区运往上海时主要存在两种运输方式：陆路与水路。陆路运输的线路一般需经过绩溪县、宁国县、湖州府、吴江县及苏州，然后直达上海；但由于清代时期道路状况恶劣、盗匪猖獗，茶商为了确保货物安全无虞，往往更倾向于采用水路运输。史料显示，水运起点设在屯溪，茶叶首先由船只沿新安江向东驶行，途径歙县、淳安、严州府、桐庐县与富阳，抵达杭州进行中转，再经过景德和金山水域最终抵达上海^[3]。再如《道光二十六年丙午进广眷清帐册》记载的：商号从歙县草墩处登记发货后，首先将货物送抵屯溪；在屯溪租船驶向黟县渔亭，到岸后改用陆路，翻越都阳湖区与新安江区之间的分界。此后，以银元聘请了约三四百名挑夫，肩挑背运茶箱至祁门；在祁门再租驳船或竹筏，沿阊江水道将茶货运往饶州^[4]。反映了茶商们对跨区域运输制度化管理的探索和实践^[5]。

晚清时期茶商在区域内逐步建立起以家族、宗族为纽带的跨县经营网络。徽州茶商利用家族联络、宗族协作等方式，通过家族内部资金的合理调配，得以在屯溪、休宁、祁门等地设立分号或联号，共享资源，提高市场反应速度^[6]。因此，徽州的茶业经营常常由父子、叔侄世代相承，逐步塑造出声名显赫的茶业世家。在徽州地区，著名的茶业家族不计其数。例如，在歙县，江氏茶商由江有科、江文赞和江耀华三代人经营，他们在芳坑村创办的“芳溪草堂”曾一度享有盛誉；绩溪地区则出现了龙川胡氏家族，由胡沆源、胡树铭、胡炳衡和胡增鑫四代人从事茶叶事业，先后创设了“胡震泰”、“胡永泰”及“胡裕泰”等茶号；祁门区域亦涌现出优秀家族，首推祁门沥川胡氏，其家族中的胡上祥和胡元龙父子两代专注茶业，创立了“祁红”^[7]。这一家族与宗族资本网络的长期稳定性，增强了徽州茶商的抗风险能力，使其能够在市场波动中维持经营，并推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商会组织通过规范行业标准、协调商业活动以及维护茶商权益等一系列举措，深度参与并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互动。商会制度的建立为茶商提供了一个定期交流和信息互通的平台，商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运输、信贷、保险等问题，从而使各地茶商能够克服地域限制，实现资源互补和优势叠加。^[8]据《芜湖县志》所载，晚清芜湖堪称“五方杂处”的都会，此地徽商人数最为众多，资本也最为雄厚。徽商在芜湖成立了诸多同业公会、商会，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社会发展进程^[9]。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在此时代变局下，徽商积极应对，借助商会的力量，在芜湖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商会制定了详细的行业规范，例如在茶叶贸易方面，对茶叶的品质分级、包装规格等都作出明确规定，促使茶叶交易更加规范有序。在协调商业活动上，以粮食贩运为例，徽商将湖广、铜陵、安庆等地的粮食，通过芜湖转运到缺粮的江南地区。既满足了市场需求，又促进了地区间的物资流通和经济往来^[10]。再如1910年祁门茶商参与的茶税抗争事件。当时，政府出尔反尔，以“茶引路股”的方式加重茶商税赋，导致皖南地区茶商联合反对。面对这一情况，祁门茶商积极响应，通过商会协调，与上海茶业会馆共同向南京两江总督发出电报，抗议安徽铁路公司恢复茶税收取。电报中提到：“据上海茶业会馆禀称，前以安徽铁路按茶每引派股六钱，因商力不支，禀由商会电请停收，业蒙前督宪批准电覆。兹闻皖路公司又欲派收，抵以茶务困难，自顾不暇，万难兼顾，仍请据情转会，永远停收等情。”^[11]成功抵制了不合

理的茶税政策，保障了茶商的合法权益。

总的来说，区域经济互动在晚清徽州茶业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一是交通网络的制度化建设，通过合同文书明确跨区域运输安排；二是家族与宗族经营网络的形成，通过账册与家族会议实现跨县资金和信息共享；三是商会制度的推动，通过地方调控与定期会议规范和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联动。上述史料不仅真实记录了各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模式，也为理解晚清徽州茶业如何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实现转型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证据。

3. 晚清徽州茶商经营创新的多维实践

晚清时期，徽州茶商在内外环境剧变的压力下，通过技术革新、制度化管理、金融工具创新、企业化转型等多维度实践，体现了徽州茶业从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商业的转型。

3.1. 技术革新与生产标准化

晚清徽州茶业的转型首先体现在制茶技术的革新与生产流程的标准化上。面对国际市场对茶叶品质的严苛要求，茶商群体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积极引入新技术以提升产品竞争力。以祁门红茶为例，其制作工艺在光绪年间经历了关键性突破。祁门茶商胡元龙于1880年借鉴印度红茶发酵技术，改良本地工艺，首创“渥堆发酵法”^[12]。该方法通过精准控制温湿度与发酵时间，使茶叶香气更为醇厚，色泽红润透亮，迅速赢得欧美市场青睐。据记载，至1895年，祁红年出口量已达“五万担以上”，占全国红茶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13]。歙县茶商则在初制环节引入机械化设备，江耀华家族于1878年从上海购置蒸汽揉捻机，将传统手工揉捻效率提升三倍，同时确保茶叶条索均匀紧结。江氏在合同中明确规定“每批茶须经机械揉捻两次”，并在茶号内设立质检岗位，对成品进行分级筛选^[14]。此类技术革新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通过标准化流程确保了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婺源茶商则针对茶叶储存难题进行改良，采用烘干法替代传统晾晒工艺，使茶叶含水量降至5%以下，耐储存性显著增强。据统计，1880年后婺源绿茶因储存期延长，运输损耗率由原先的15%降至5%以下^[15]。这些技术创新使得徽州茶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后续规模化经营奠定了基础。

3.2. 交易规范化

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徽州茶商开始突破传统口头约定的交易模式，逐步建立起规范化的合同制度。1879年，歙县吴氏茶号与周边茶农签订《茶叶包购契约》，首次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定价每斤纹银八分，交货期限以谷雨为限，逾期每日罚银一钱”^[16]。其条款涵盖品质标准、交货时间、违约责任等要素，体现出明显的现代契约精神。至光绪末年，此类合同在徽州茶区已普遍推行。祁门茶商在《茶业交易规约》中进一步规定：“凡大宗交易，须立字为凭，三日内交割现银”，将票据支付与书面合同相结合，形成双重风险防控机制^[17]。合同制度的规范化不仅降低了交易纠纷的发生率，还促进了商业信用的积累。以屯溪茶业公会档案记载的1892年纠纷案为例，休宁茶商因未按合同约定交付足量茶叶被诉至公会，公会依据契约条款裁定其“补偿差额并罚银十两”，此判决被收录为典型案例供其他茶商借鉴^[18]。这种制度化管理模式，使得徽州茶业逐渐摆脱传统人情交易的局限性，向现代商业体系迈进。

3.3. 金融工具创新

与此同时，一些茶商开始尝试使用票据（如汇票、银票等）作为交易支付工具。票据交易不仅简化了交易流程，还通过明确票面金额和还款期限，加速了资金流转，有效缓解了因地域隔阂而导致的资金滞留问题^[19]。汇票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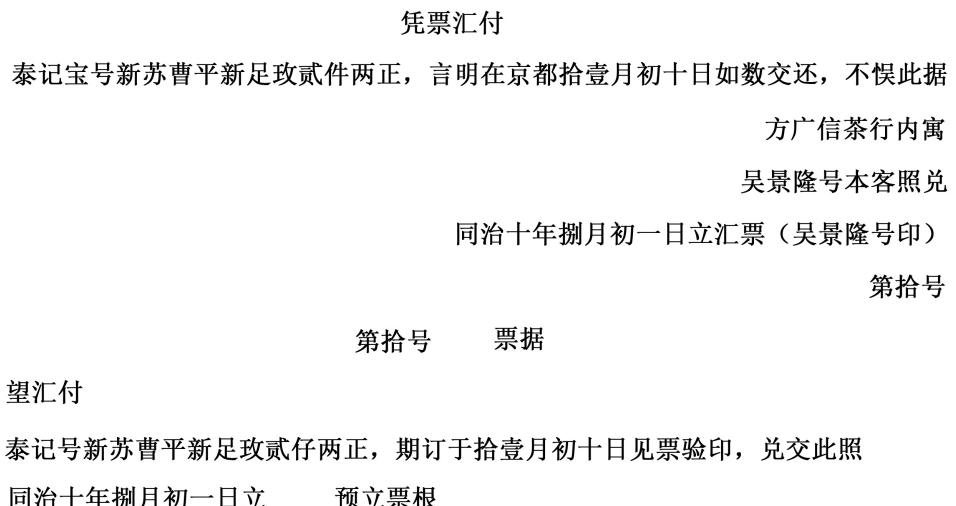


Figure 1. Bill of Exchange of the Wujinglong Trading House, Tenth Year of the Tongzhi Reign
图 1. 《同治十年吴景隆号汇票》

书面合同和票据交易制度的推广，使得商业往来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为整个区域内茶叶流通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可预测的市场环境。

3.4. 企业化转型与组织管理创新

传统上，徽州茶商多依靠家族传承和小规模作坊式经营，但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竞争日益激烈，单一的家族经营模式逐渐显露出局限性。1887年，吴氏家族内部首次召开茶商会议，会议中明确规定由家族中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士担任管理职务，并实行分工负责、利益共享的企业化管理模式[20]。

在管理经营方式上也进行了创新。徽商开始建立现代会计制度，如祁门胡氏茶号在光绪初年即采用“四柱清册”记账法，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分类登记，并定期编制资产负债表[21]。这种管理模式的转型，使得茶商能够有效控制成本、优化资源配置。部分大型茶号开始尝试品牌化经营，如屯溪“同福昌”茶号在包装上统一印制“双狮商标”，并通过《申报》刊登广告，宣称“品质如金，驰名南北”[22]。开创了徽茶品牌营销的先河。

总体而言，晚清时期徽州茶商在当时的变局中，通过技术改进、合同制度、金融工具、以及企业化管理等多方面的创新，推动了徽州茶业市场化与规范化的转型。

4. 结语

晚清徽州茶业的转型不仅是徽商应对时代变局的适应性策略，更是区域经济互动与经营创新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一转型过程充分体现了传统手工业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市场网络重构、技术革新和金融工具引入，实现由分散经营向区域一体化经营的跨越。

徽州茶商依托交通条件的改善，建立起以屯溪、上海、广州等地为枢纽的跨区域市场网络，形成了稳定的区域经济互动机制。这一网络不仅提升了茶叶流通效率，也促进了资源整合，使得徽商在面对市场竞争时能够快速调整经营策略。同时，制茶技术的标准化与创新(如祁门红茶的渥堆发酵工艺和歙县的机械揉捻技术)极大地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徽州茶叶在国内外市场的崛起。此外，票据交易与合同制度的推广，有效降低了商业交易中的风险，加快了资本流通，为近代金融体系的萌芽提供了实践基础。

徽州茶商的成功转型为中国传统手工业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经验。一方面，区域经济互动促进了市

场一体化和产业升级，为传统行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和经营模式的优化，使得传统手工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活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茶商们的经营创新不仅推动了茶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商业体系的完善。

徽州茶商的转型也面临着挑战。随着外部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外国资本的进入，部分茶商由于管理模式落后、家族经营弊端显现，未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最终导致企业衰落。这一历史经验提醒我们，传统产业的现代化不仅需要技术和市场的支持，更需要制度的持续优化和企业管理能力的提升。

放眼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进步正在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徽州茶商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强化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金融制度建设，才能确保产业在现代市场体系中保持竞争优势。这一启示对当前中国茶业乃至其他传统行业的转型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黄茜.近代徽州茶商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安徽农业大学,2017.
- [2] 陈祖梨, 朱自振. 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M]. 北京: 北京农业出版社, 1981.
- [3] 张燕华, 周晓光. 论道光中叶以后上海在徽茶贸易中的地位[J]. 历史档案, 1997(1): 95-101.
- [4] 江怡桐. 歙县芳坑江氏茶商考略[M]//张海鹏, 王廷元, 主编. 徽商研究.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588-589.
- [5] 冯剑辉. 近代徽商研究[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
- [6] 蒋甲琛. 晚清时期婺源茶商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9.
- [7] 王珍. 徽商与茶业经营[J]. 徽州社会科学, 1990(4): 1017-1021.
- [8] 王廷元. 论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J]. 中国史研究, 1995(3): 39-46.
- [9] 余谊密. 芜湖县志[M]. 合肥: 时代出版传媒黄山书社, 2008.
- [10] 梁仁志. 明清时期徽州与芜湖的经济互动[J]. 安徽史学, 2018(4): 102-110.
- [11] 电请停收茶引路股[N]. 申报, 1910-04-21(19).
- [12] 蒋学楷. 祁门红茶[J]. 农村合作, 1936, 2(3): 96-97.
- [13]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编著. 豫鄂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0: 91-103.
- [14] 江耀华档案[Z]. 黄山市档案局(馆)藏.
- [15] 范和钧. 中国洋庄绿茶调查记[J]. 国立武汉大学理科季刊, 1933, 4(1): 71.
- [16] 张海鹏, 王廷元.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 合肥: 黄山书社出版社, 1985: 203.
- [17] 王廷元. 徽商与上海[J]. 安徽史学, 1993(1): 38.
- [18] 屯溪茶业公会档案[Z]. 安徽省档案馆馆藏。
- [19] 楚子轩. 清末民初歙县茶商研究(1840-1919) [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安徽农业大学, 2021.
- [20] 何治基, 等, 撰. 安徽通志[M]. 北京: 京华书局, 1967: 45-67.
- [21] 丰同禧. 祁门红茶销售之程序[J]. 银行周报, 1937(16): 7-25.
- [22] 软文[N]. 申报, 1895-3-18(4).